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 世界 投资报告 2017

投资与数字经济

要旨和概述



联合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 世界 投资报告 2017

投资与数字经济

要旨和概述



联合国

2017年，纽约和日内瓦

# 说明

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处理所有与外国直接投资和多国企业相关议题的协调中心。它凭借在投资和企业发展的研究和政策分析方面积累了四十多年的经验和国际专门知识，促进建立政府间共识，并向150多个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本出版物所载材料的版权归贸发会议所有。材料可自由引用或转载，但请注明出处并提及贸发会议和本报告。应将一份引用或转载了此种材料的出版物寄送贸发会议秘书处(电邮: [diaeinfo@unctad.org](mailto:diaeinfo@unctad.org))。

本概述是根据《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与数字经济》(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17.II.D.4)中所作的深入分析编写的。

UNCTAD/WIR/2017 (Overview)

版权 © 联合国，2017年  
版权所有  
联合国印刷，日内瓦

# 前言

2016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额减少了大约2%，降至1.75万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下降幅度更大，为14%，对最不发达国家和结构薄弱经济体的投资流量仍然飘忽不定，数额低下。虽然贸发会议预测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17-2018年期间会有温和复苏，但预期仍会远远低于2007年达到的最高水平。

这些动态令人不安，尤其是考虑到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联、在贸发会议《可持续发展目标投资行动计划》中详述的巨大投资需求，就显得更为棘手。要想取得可持续发展的进展和实现持久和平，就需要加大对基本基础设施、能源、水和清洁卫生、减解气候变化以及健康和教育的投资，并加大生产力投资以便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

现在，要确保全球政策环境始终有利于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贸发会议通过对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制度提供指导意见，在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130多个国家采用了贸发会议的《投资政策框架》和《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路线图》制订新一代投资政策。今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是以这一进程记录为基础编写的，就如何应对近3,000项老一代投资条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当前全球经济对政策制定者的一大挑战是数字发展。今年《报告》的主题章节显示，数字经济正在对全球投资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本《报告》就数字经济对原本为模拟时代制定的投资政策产生的种种影响作了重要洞察，并就投资政策如何才能支持数字发展提出了建议。

我认为，这份《报告》是国际投资和发展界的一个重要工具，特此推荐。



联合国秘书长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 序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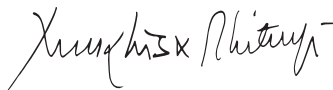
数字经济正在成为全球经济日益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诸多新的机遇。随着数字经济的到来，也出现了各种严峻的政策挑战——首先需要弥合数字鸿沟。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些机遇和挑战都是占首位的政策优先事项。

数字经济从根本上改变着企业跨界生产和营销货物及服务的方式。数字多国公司能在不必对外国市场注入多少有形投资的条件下与海外客户沟通并向其销售产品。因此，就生成生产能力和创造就业而言，这类公司对于东道国具有的经济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并非那么直接可见。而且，数字经济今天关系到的已经不再仅仅是技术部门和数字企业，而是越来越多地涉及到跨越全球经济所有部门的供应链的数字化。

国际生产的数字变革，对于投资的促进和便利，对于规范投资者行为的法规，都具有重要影响。可能需要参照新的数字工商模式审查为实体经济制定的规则。有些国家已经采取了更新政策的步骤；有些国家则面临任由规则过时淘汰或无意中拖延数字发展的风险。

其中的原因在于这关系到的不仅仅是数字多国公司。这还关系到开发国内的数字化能力。世界上有很多国家都制订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然而，大多数此类战略都未能恰如其分地处理投资问题。而其中处理了投资问题的，则往往单纯侧重于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应当扩展数字发展战略的投资政策层面，以便使国内企业能够获益于数字化和全球市场的更便捷准入。

《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为数字经济的投资政策综合框架提出了一种中肯的论据。《报告》展示了将投资政策与数字发展战略相匹配，就能在帮助发展中国家以获益的方式融入全球经济，及在未来的岁月里实现更加包容和可持续的全球化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对于有关如何才能缩小数字鸿沟和应对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艰巨投资挑战的论述，这是一种不可磨灭的贡献。我谨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界推荐这份报告。



贸发会议秘书长  
穆希萨·基图伊

# 鸣谢

《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由James X. Zhan(詹晓宁)领导的小组编写。小组成员有：Richard Bolwijn、Bruno Casella、Hamed El Kady、Kumi Endo、Thomas van Giffen、Michael Hanni、Kálmán Kalotay、Joachim Karl、Hee Jae Kim、Ventzislav Kotetzov、Isya Kresnadi、Guoyong Liang(梁国勇)、Hafiz Mirza、Shin Ohinata、Diana Rosert、Astrit Sulstarova、Claudia Trentini、Elisabeth Tuerk、Joerg Weber和Kee Hwee Wee。

Jorun Baumgartner、Lorenzo Formenti、Mark Huber、Malvika Monga和Linli Yu(于林立)提供了研究支持和投入。Dafina Atanasova、Charalampos Giannakopoulos、Natalia Guerra、Mathabo Le Roux、Anthony Miller、Abraham Negash、Moritz Obst、Sergey Ripinsky、Jacqueline Salguero Huaman、Ilan Strauss以及实习生Anastasia Bessonova、Mohamed Mrad Namji和Armando Pascale也做出了贡献。

Bradley Boicourt、Mohamed Chiraz Baly和Lizanne Martinez提供了统计协助。

Caroline Lambert协助编辑了手稿，Lise Lingo编辑了清稿。Pablo Cortizo负责图表、地图及信息图的设计，并和Laurence Duchemin共同负责了报告的排版。Elisabeth Anodeau-Mareschal、Anne Bouchet、Nathalie Eulaerts、Rosalina Goyena、Peter Navarrette、Sivanla Sikounnavong和Katia Vieu为《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的印制提供了支持。

Michael Kende为《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了有益的建议。在编写报告的不同阶段，特别是为讨论草稿而举行专家会议期间，编写小组得益于以下专家的意见和投入：Azar Aliyev、Robert Atkinson、Nathalie Bernasconi、Philippa Biggs、Lisa Borgatti、Jansen Calamita、Patrice Chazerand、Silvia Constain、Christopher Foster、Torbjörn Fredriksson、Xiaolan Fu、Ambika Khurana、Markus Krajewski、Simon Lacey、James Lockett、Fernando Loureiro、Erik van der Marel、Makane Moïse Mbengue、Teresa Moreira、Jan Mischke、Ghislain Nkeramugaba、Davide Rigo、Cristián Rodríguez Chiffelle、Stephan Schill、Jagjit Singh Srail、Leonard Stiegeler、Alykhan Vira和Eric White。

还要感谢贸发会议其他各司作为内部同行审查进程的一部分提出了评论，秘书长办公室也提出了评论。联合国制图科在区域地图方面提供了咨询意见。

一些中央银行、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许多工作人员也为《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作出了贡献。此外，贸发会议感谢所有对其2017年世界投资前景和投资促进机构调查作出答复的多国企业和投资促进机构高管所提供的支持。衷心感谢瑞典政府提供的资助。

# 目录

前言	iii
序言	iv
鸣谢	v
要旨	vii
概述	1
投资前景	1
全球投资趋势	6
区域投资趋势	15
投资政策趋势	20
投资与数字经济	30

# 要 旨

## 投资前景

全球投资正在温和复苏，对2017年的预计是审慎乐观的。各主要区域的经济增长期望较高，贸易增长率和企业利润率的恢复有可能支持外国直接投资的小幅上扬。预估全球流量在2017年会增加至接近1.8万亿美元，在2018年继续增长至1.85万亿美元 - - 尽管仍然低于2007年的最高值。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治风险有可能会阻碍这一复苏，税务政策的变化有可能对跨界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外，外国直接投资前景在大多数区域都是较为积极的。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量预期将增加约10%。这包括亚洲发展中地区较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因为其中各主要经济体有所改观的前景很可能使投资者增强信心。随着原油价格预计略有上扬和区域一体化的推进，对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预期也会增加。相形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宏观经济和政策的展望不确定性使得外国直接投资前景渺茫。转型期经济体于2016年走出经济谷底之后，进入这类经济体的投资流量很可能会进一步复苏。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量预期在2017年会保持不变。

## 投资趋势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继2015年强劲上扬之后，在2016年失去了增长动力，显示出复苏之路的崎岖坎坷。由于多国企业看到了经济增长乏力和重大政策风险，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减少了2%，降至1.75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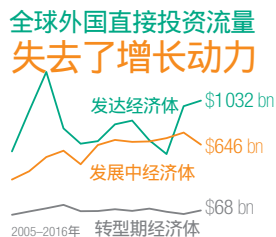


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流量受挫尤为严重，减少了14%，降至6,460亿美元。与证券投资、侨汇和官方发展援助相比，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



发展中经济体最大和最为恒定的外部资金来源。但是，所有发展中区域的流入量都有下降：

- 进入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16年收缩了15%，降至4,430亿美元。这是五年来的首次下降，范围相对较广，降幅在除南亚以外的大多次区域都达到了两位数。
- 进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继续下滑至590亿美元，比2015年减少了3%，主要是初级商品价格低下的反映。
- 进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滑趋势有所加速，流入量减少了14%，降至1,420亿美元，原因在于经济衰退持续、初级商品价格疲软以及出口受到的压力。
- 对结构乏力和薄弱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脆弱的。进入最不发达国家的流量减少了13%，降至380亿美元。与此相似，进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流量减少了6%，降至35亿美元。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稳定在240亿美元。



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量继上一年的大幅增长之后进一步上扬。流入量增加了5%，达到1万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在北美洲的温和增长和在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大规模增长抵消并大于在欧洲的下降幅度。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中所占的份额扩大到了59%。

对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经历了两年急剧下滑之后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80亿美元 - - 是大规模私有化交易和增强了采矿活动投资的反映。

主要的经济集团，如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受到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趋势的强劲影响。进入20国集团的投资流量首次创纪录地超过了1万亿美元。在一些集团中，集团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一个日渐突出的特点。

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仍然乏力，减少了11%，降至1万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源于欧洲多国企业的投资暴跌。北美洲的投资流出量保

持平稳，但亚太地区发达国家的投资流出量达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流量出现1%的降幅，减少至3,830亿美元，尽管中国的对外投资流量激增，现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投资国。

国际生产增长率进一步放缓使扩大全球贸易的前景暗淡。多国企业外国分公司的国际生产活动仍在扩张，但近些年来放慢了速度。外国分公司的销售额、增加值和就业率过去五年的平均年度增长率(分别为7.3%、4.9%、4.9%)均低于2010年以前的同期(分别为9.7%、10.7%、7.6%)。

贸发会议关于国有多国企业的新数据库展示了这类企业在全全球经济中日益扩大的作用。大约1,500家国有多国企业(占全部多国企业的1.5%)拥有86,000多家外国分公司，接近所有外国分公司的10%。这些公司公布的绿地投资在2016年占全球总数的11%，高于2010年的8%。其总部广为散布，半数以上在发展中经济体，近三分之一在欧洲联盟。中国是最大的母国经济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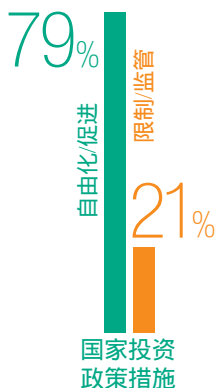
## 国有多国企业在全全球经济中日益扩大的作用



## 投资政策趋势

投资政策的制定正在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和更不稳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种种考虑加大了投资政策的挑战性和多面性。政策的制定也变得更为多样化，反映出社会和政府正在用各种办法应对全球化的影响。这种局面，加上更多的政府介入行为，也降低了投资政策在投资者眼中的可预测性。对于各种投资关系，一个信用可靠、得到广泛国际支持并且以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为目标的、基于规则的投资制度，可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改善稳定性。

2016年实行的大多数投资政策措施都以投资促进、便利和自由化为目标。约有58个国家和经济体采取了至少124项投资政策措施 - - 这是2006年以来最大的数目。很多产



业放开了外国投资者的准入条件，许多国家简化了注册程序，实行了新的投资激励办法或持续了私有化进程。在这些措施中约有五分之一实行了新的投资限制或章程，远多于1990年代贸发会议年度报告的早期阶段。这些限制和规章的表现形式不仅是新的法规，而且还表现为行政决定，尤其是在涉及到外国收购的兼并管控方面。

许多国家通过专门的投资法治理跨界投资，所处理的一系列问题与国际投资协定处理的问题相似。至少108个国家具有这种法律。投资法和国际投资协定在序言、定义、投资者进入和待遇、投资促进和争端解决方面具有共同的要件。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和投资法相应条款的更新应当齐头并进。

国际投资协定体系继续扩大，更为庞杂。2016年缔结了37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使此类条约的总数在年底达到了3,324项(2017年已经又缔结了4项)。在同一时期内，至少有19项国际投资协定终止了效力，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所有这些都反映出，政府扩大了对国际投资政策参与的再调整力度。

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新发诉讼案件仍然有增无减。在2016年，提起了62件新的诉讼，使已知案件的总数达到767起。至2016年底，在就案情作出裁定的所有案件中，投资者胜诉的占60%。

20国集团的成员国通过了《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这套非约束性的20国集团原则以贸发会议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为基础，是在包括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等不同经济体构成的一个集团内就投资问题首次达成的多边协商一致意见，这些经济体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全球外向外国直接投资。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巩固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一阶段成果的基础上，大多数新的条约参照了贸发会议的《路线图》(《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路线图》提出了五个行动领域：在提供保护的同时维护监管权；改革投资争端解决办法；促进和便利投资；确保负责任的投资；增强制度的一致性。争端解决办法的改革在议程上处于优先位置，规定了需采取的具体步骤(例如新条约中以改革为导

+37  
2016年

国际投资  
协定总数  
3,324项

向的条款，关于建立国际投资法院的工作)，包括在 多边层面应当采取的步骤。投资便利已经成为越来越受关注的一个领域，贸发会议的《投资便利全球行动菜单》得到了所有投资和发展利益相关方的大力支持。另外，近期的一些条约含有新的措辞，维护了东道国监管或扶持负责任投资的权利。

现在已经到迈向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二阶段的时候了：既有老一代条约的整体现代化。旧有的条约为数众多：当前有效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有 2,500 多项是 2010 年以前缔结的(占全部有效条约的 95%)。旧条约有其不良影响：截至 2016 年底，几乎所有已知的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诉讼案件都是以这类条约为依据提起的。而且，旧条约将种种不一致加以固化：其持续存在造成条约关系的重叠和破碎，形成交叉挑战。

贸发会议介绍和分析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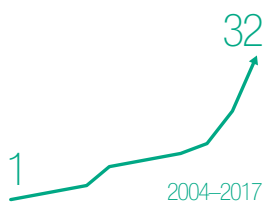
阶段 10 个政策选项的利弊：(1) 共同解释条约条款；(2) 修订条约条款；(3) 更替“过时的”条约；(4) 巩固国际投资协定网络；(5) 管理共存条约之间的关系；(6) 参照全球标准；(7) 开展多边协作；(8) 摒弃未经批准的旧条约；(9) 终止已有的旧条约；(10) 退出多边条约。各国可调整适用和采纳这些选项，按照自己的政策优先事项开展《路线图》中提出的改革。



要想确定这 10 个政策选项中有哪些在特定

情况下适合于一个国家，就必须开展慎重且以

事实为根据的成本效益分析，同时应对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挑战。各种战略挑战中包括防止改革“过头”，这种情况会使国际投资协定制度脱离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宗旨。制度性挑战源于在连贯性和一致性上造成问题的种种差距、重叠和破碎现象。协调性挑战要求改革行动主次分明，找到恰当的条约伙伴贯彻此类行动并确保不同政策制定层面所



## 实行可持续性 报告指导的证券 交易所日益增多

做改革努力的一致性。能力挑战使得较弱小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难以应对老一代国际投资协定具有的各种缺陷。

增强多边支持会有利于综合性的制度改革。贸发会议是联合国负责处理国际投资问题的协调中心和就当今多层和多面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开展高级别和包容性讨论的国际论坛，通过其研究和政策分析、技术援助及建立政府间协商一致意见这三大工作支柱，可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为促进对可持续工商业的投资和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资本市场相关政策和工具，正在全世界迅速增加。这类政策和工具主要源于证券交易所及其监管者，但也包含其他资本市场利益相关方如机构投资者的有力参与。证券交易所能够通过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通过支持监管者促进采纳市场标准，对投资者和公司产生影响，鲜有其他行为者能以相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

## 投资与数字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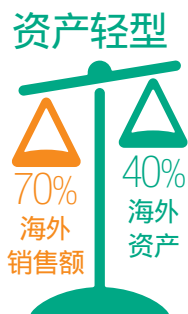
数字经济是增长和发展的一种关键驱动力。数字经济能够推动跨越所有部门的竞争力、经营和创业活动的新机会、进入海外市场的新渠道和对全球电子价值链的参与。数字经济还能处理各种发展难题提供新的工具。然而，数字经济也带来了一系列政策挑战，包括需要弥合数字鸿沟，尽可能减少潜在的负面社会和发展影响，以及处理复杂而具体的互联网监管问题。与数字经济相联系的机遇和挑战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数字经济对投资具有重要影响，而投资对于数字发展又至关重要。采用数字技术具有改变多国企业国际运营活动和外国分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的潜力。所有国家的数字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数字经济的参与，都要求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投资政策。



## 贸发会议的 数字多国企业 100强新排名

在过去五年当中，信息和通信技术多国企业在国际生产中的比重激增。2010年至2015年期间，贸发会议排名的多国企业100强中，技术公司的数目增加了一倍以上。这类多国企业的资产增长了65%，营业收入和雇员人数增长了约30%，而100强行列中的其他多国企业则走势平淡。包括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和数字内容公司在内的数字多国企业的重要性也在迅速扩大。《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了新的企业100强，排列了数字多国企业及其国际生产足迹。



数字多国企业的资产仅有40%放在母国以外，但销售额的大约70%在海外实现。数字多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影响，在有形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直接可见度较低，但其投资可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和生产力影响，并促进数字发展。

在全球供应链中跨越所有产业采用数字技术将对国际化生产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视产业和多国企业的具体侧重点而定，数字技术能够帮助减少对集约型“大数据赋能”生产活动的大规模投资，而且还可由此走向更为便捷分散型3D打印生产活动。数字技术有助于生产活动回流，但也能帮助实现更多的服务外包。而且，数字技术可帮助重组东道国内的供应商关系并带来新的伙伴协作机会。

投资规则和章程，以及促进和便利投资的政策和机构，应当考虑到各种演进中的多国企业跨界经营模式。在受数字化影响最大的前10位传统产业中，有5种与维持投资限制(体现为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作出的保留)的国家中的前10位产业相重合，而数字多国企业正在向其他受管制部门扩张。一些模拟时代的章程可能需要加以审查，避免成为过时的产物或无意中阻碍数字技术的采用。

投资  
成本估计：  
低于  
数字  
发展战略  
25%<sup>的</sup>

由于数字机会具有潜在的发展裨益，大多数国家都在积极地追寻这一机会。《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载有对100多项国家和区域数字发展战略投资层面的调查结果。

很多数字发展战略，要么未能处理投资问题，要么仅仅很一般化地提到投资需要。其中包含基础设施投资需要详情的不到25%，提到基础

设施以外包括数字产业开发投资需要的还不到5%。鲜有投资促进机构参与拟订数字发展战略的情形。

综合全面的数字发展战略应当覆盖对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公司和跨所有产业的各种公司采用数字技术的投资。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充分连通而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并不像通常想见的那么庞大，贸发会议估计，这些国家实现几乎全面的基本3G网络覆盖面(这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普遍准入指标的先决条件)所涉及到的投资成本不到1,000亿美元。开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区域投资合作，可以增加基础设施项目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促进对本地数字内容和服务的投资，对于加快数字发展至为关键。这意味着需要为数字公司建立和保持一个有利的监管框架，并采取积极的支持措施，其中可包括技术或创新枢纽或孵化器；建设或改进电子政务服务；支持创投供资和其他创新型筹资办法。与全球化公司建立关联可能会有帮助，但数字行业的发展主要是支持本地企业发展，而不是偏重于促进数字多国企业的投资。

促进跨越所有公司的信通技术投资以及促进各种工商关联和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应当成为数字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各种设备收费和缴税及互联网使用税也会影响到公司采用信通技术的有效成本。便利各种云服务的接入可降低此类成本。技能发展 - - 可与全球性数字多国公司开展这方面的伙伴协作 - - 对于帮助本地公司与多国企业开展数字互动和进入电子价值链也很重要。

政策制定者在促进数字发展投资的同时，需要处理各种公共关切。这就要求在数据安全、隐私权、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保护和维护文化价值观等领域制定与时俱进的法规。如果数字变革在其他部门造成干扰或产生了负面的社会或经济影响，就需要出台政策缓解此类影响。政府需要找到平衡的办法兼顾公共关切和私人投资者的利益。

投资政策制定者应当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方法制定数字发展战略。他们不仅应当在自己主管的政策领域为关键的变革做好准备，还能对制定和执行数字产业政策作出重要贡献，而且，应当把投资政策嵌入数字发展战略。

# 概述

## 投资前景

### 审慎乐观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预计在2017年会有温和复苏，尽管流量预期仍会远低于2007年的最高峰。各主要区域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步的回升和有所改善的公司利润率将会增强工商界的信心和多国企业的投资意愿。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周期性复苏预期会加快发达国家的增长，而初级商品价格的可能上扬应能为发展中经济体在2017年实现复苏提供支持。因此，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预期在2017年将增加5%，达到近1.8万亿美元(图1)。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温和上升预期在2018年将会持续，达到1.85万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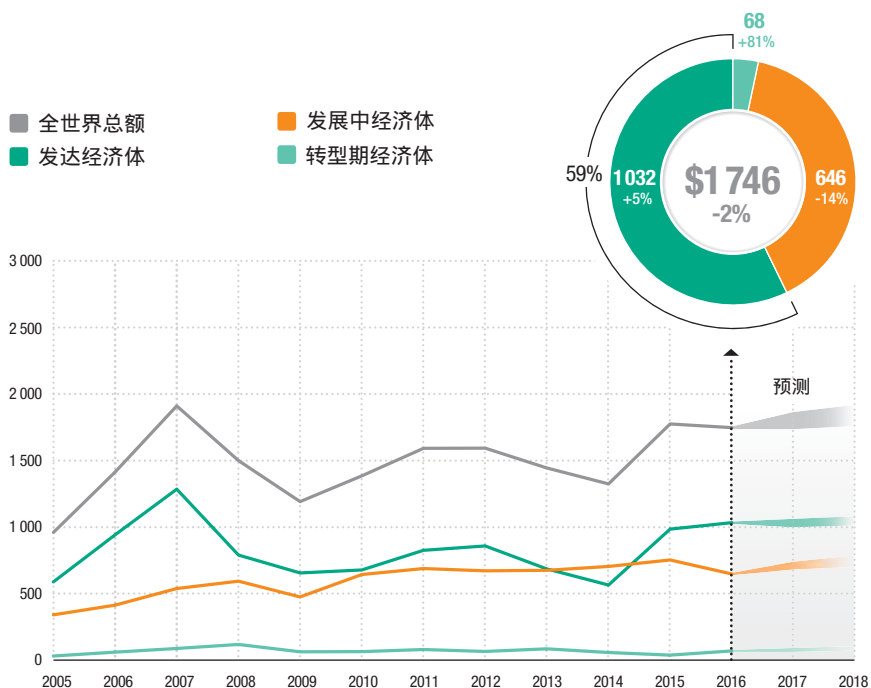
投资者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和政策不确定性更为严峻，可能会对外国直接投资2017年的复苏规模和轮廓产生影响。一些政治动态，如英国退出欧盟，美国政府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主要贸易协定的动向，以及欧洲的各种大选，都会加重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可能实行的税收改革使得美国的多国企业减少其海外分公司持有的收益留存，就也可能对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产生重大影响。

贸发会议2017年的工商调查结果表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恢复了乐观。与2016年不同，受访的多数高管人员，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此类人员，对于经济好转将会增强且在未来的一些年里将能促进增加投资抱有信心(图2)。与去年相比，可以看出初级产业部门的公司有一种重要的情绪变化。以自然资源尤其是原油产业为基础的多国企业在经历了过去两年的下滑重挫之后，似乎形势已经好转，大多数高管人员现在都预期在今后两年加大投资力度。



图 1.

## 2005-2016年按全球及经济体类别分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和2017-2018年预测 (以10亿美元为单位和以百分比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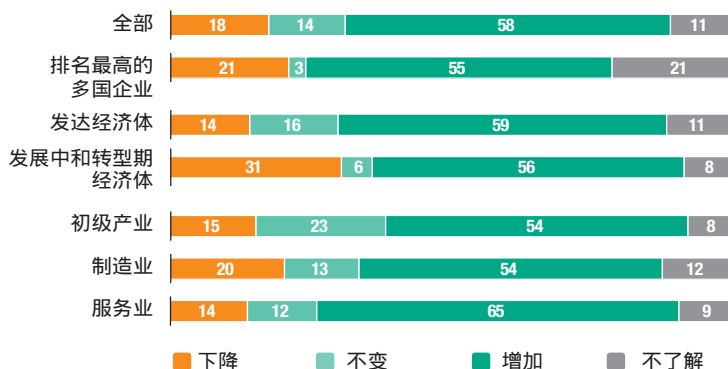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可能目的地中，美国、中国和印度仍居首位(图3)。高管人员对亚洲发展中地区的经济业绩保持信心，预计会按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和新加坡这样一个顺序排列加大对东南亚的投资，所有这些国家都提高了在最具潜力东道国中的排名。

从贸发会议2017年投资促进机构调查得到的答复中，可以看出这些机构认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潜力最大的产业。发达经济体的投资促进机构着眼于信息技术和各种专业服务，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促进机构都把农业综合企业视为最具潜力的产业。包括电信、数据处理和软件编程在内的信息和通信行业，在若干发展中国家也正在成为投资的标的产业。根据投资促进机构的看法编拟的2017年最佳前景投资者国家排

图2.

### 高管人员对2017-201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预期 (在各区域和部门高管人员中所占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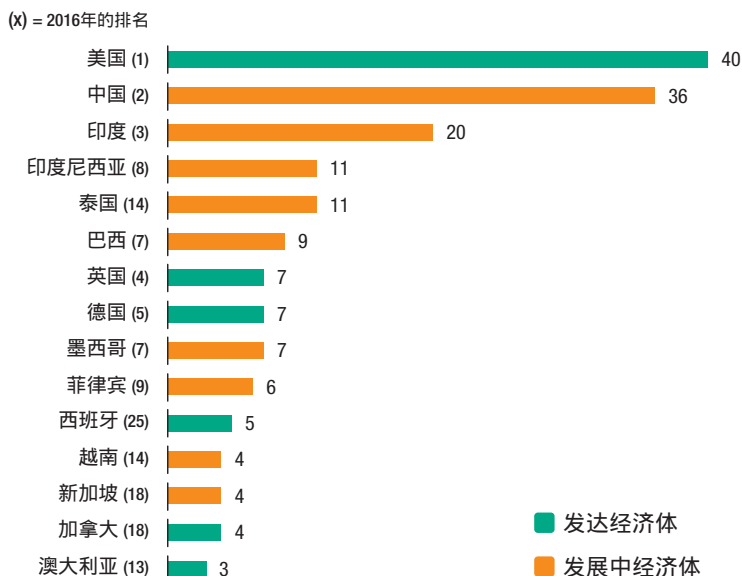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工商调查。

注：因四舍五入，数据相加之和可能不到100。

图 3.

### 2017-2019年多国企业最具前景的东道经济体 (占作出答复高管人员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工商调查。

名清单延续了近些年来的趋势：中国仍然是最具潜力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紧随其后的是美国、德国和英国。

## 大多数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预期将会增长

发展中经济体的外资流入量在2017年有可能增长10%，但还不能完全回到2015年的水平，同时，进入发达经济体的流量预期会保持平稳。各区域之间将会存在重大差异(表1)。

鉴于原油价格略有上涨，而非原油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有可能增加，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预期在2017年会小幅增长，达到约650亿美元。公布的2016年绿地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在房地产业的比例很大，其次是天然气、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化工产业和汽车制造业。由于一些区域经济共同体与欧洲联盟(欧盟)签署了经济合作伙伴协定，并且就《三方自由贸易协定》开展了谈判，区域和区域间合作取得了进展，理应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加大起到鼓励作用。但是，经济增长率的暴跌有可能妨害2017年的投资前景。

由于亚洲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前景有所改观，很可能会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预期在2017年将会增长15%，达到5,150亿美元。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主要接受国，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而进一步开展的政策努力可能会推动投资流入量在2017年的增长。在南亚和东南亚，预期若干国家会进一步增强自己在区域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在西亚，由于原油价格逐步回升的积极影响被政治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所抵消，预期外国直接投资将会保持原状。

鉴于宏观经济和政策层面的不确定性持续存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017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前景依然暗淡。投资流量预期会减少大约10%，降至约1,300亿美元。由于运营商在投入资本开支上退缩不前，对该区域采掘业的投资可能幅度不大。对该区域特别是中美洲的投资，还有可能受到美国经济决策不确定性的影响。

表 1.

2014-2016年按经济体类别和区域分列的外国直接投资  
流入量及2017年的预测 (单位: 10亿美元和百分比)

经济体类别/区域	2014	2015	2016	预测
				2017
全世界	<b>1 324</b>	<b>1 774</b>	<b>1 746</b>	<b>1 670 to 1 870</b>
发达经济体	<b>563</b>	<b>984</b>	<b>1 032</b>	<b>970 to 1 080</b>
欧洲	272	566	533	560
北美洲	231	390	425	360
发展中经济体	<b>704</b>	<b>752</b>	<b>646</b>	<b>660 to 740</b>
非洲	71	61	59	65
亚洲	460	524	443	51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70	165	142	130
转型期经济体	<b>57</b>	<b>38</b>	<b>68</b>	<b>75 to 85</b>
备注: 年度增长率(百分比)				
全世界	<b>-8</b>	<b>34</b>	<b>-2</b>	<b>(-4 to 7)</b>
发达经济体	<b>-18</b>	<b>75</b>	<b>5</b>	<b>(-9 to 2)</b>
欧洲	-20	108	-6	~5
北美洲	-15	69	9	~-15
发展中经济体	<b>4</b>	<b>7</b>	<b>-14</b>	<b>(2 to 15)</b>
非洲	-4	-14	-3	~10
亚洲	9	14	-15	~1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3	-3	-14	~-10
转型期经济体	<b>-33</b>	<b>-34</b>	<b>81</b>	<b>(10 to 25)</b>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随着经济下滑走出谷底, 原油价格上涨和私有化计划的执行, 对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这一形势的支持下2017年可能略有增长, 达到约800亿美元。但是, 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由于一系列地缘政治问题而受到阻碍。

对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预期在大约1万亿美元的水平上保持平稳。由于2016年的巨额公司内部贷款负账不可能维持不变, 预计对欧洲的投资量将会得到恢复。但是, 各种政治事件可能会使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脱轨。相形之下, 在2016年大于以往水平的对北美洲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似乎正在减弱势头, 多国公司的高管人员面对政策上的不确定性, 可能会采取观望态度。

## 全球投资趋势

###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16年失去了增长动力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2016年减少了2%，降至1.75万亿美元，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全面复苏的道路仍然坎坷。公司内部贷款大幅下降，跨界兼并和收购值18%的增幅助推了股权投资。投资量在发达国家的温和增长和在转型期经济体的大幅增长，部分程度上抵消了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流入量的下降。因此，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中的份额上升到了59%。

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流量增长了5%，升至10,320亿美元。对北美洲流量的温和增长及对其他发达经济体投资的大幅增长抵消并大于对欧洲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下降幅度。发展中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在2016年处于劣势。初级商品价格疲软和经济增长放缓都对外国投资流入量造成压力，减少了14%，降至6,460亿美元。对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情况与此截然不同，跃升至680亿美元，扭转了过去两年的下滑走势。

在排名前十的东道经济体中，发展中经济体继续占有半数(图4)。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吸引的流入量为3,910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在大规模跨界兼并和收购活动的支持下从2015年的第14位跃居第二，达到2,540亿美元。中国排在第三，流入量为1,340亿美元，与上一年相比下降了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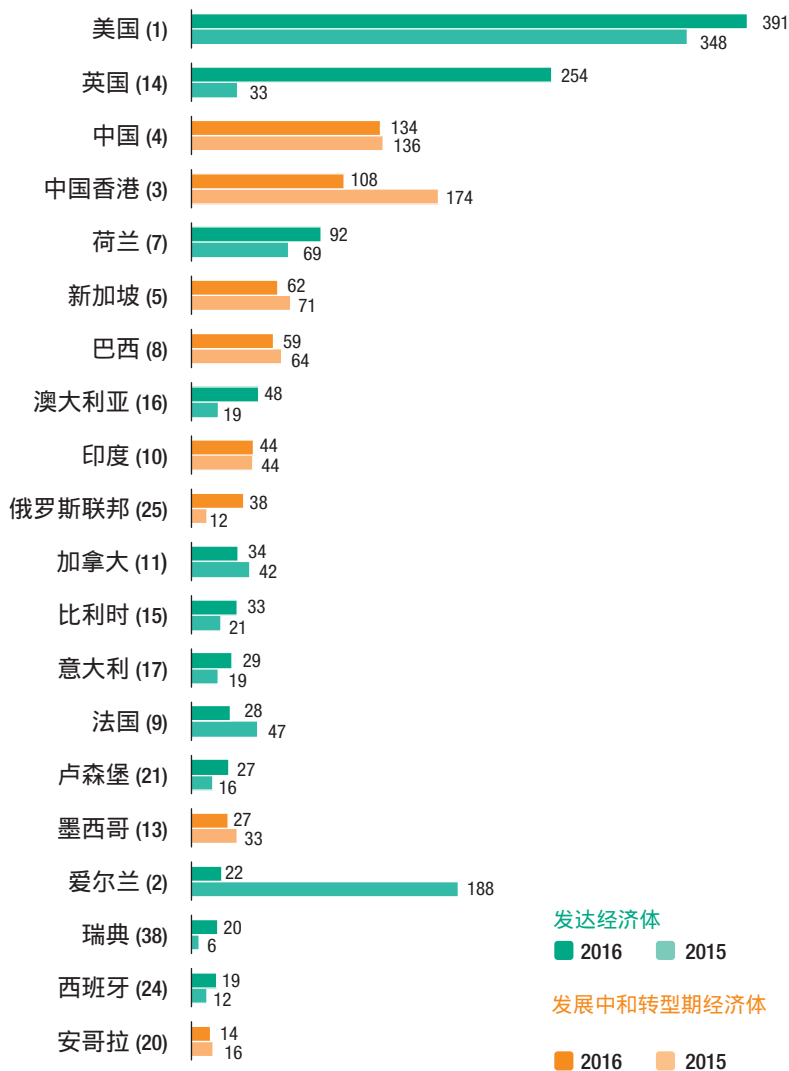
### 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重要资金来源

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全球外部资金流量2016年估计为1.4万亿美元，少于2010年的2万多亿美元。在流入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外部资金当中，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为数最多和不确定性最小的资金(图5)。从总体上看，这类资金流量远远低于至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要的年度投资水平(《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

图 4.

2015年和2016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排名前20位的东道经济体(单位:10亿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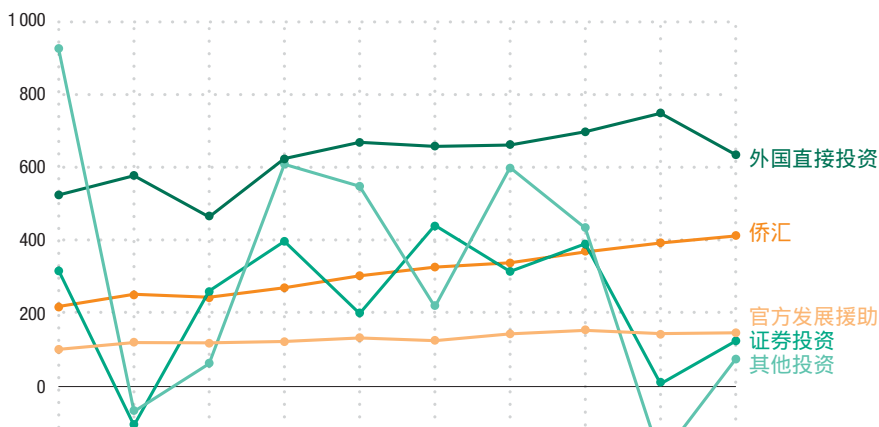
(x) = 2015 年的排名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图 5.

## 2007-2015年进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外部发展资金 (单位：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数据(证券投资及其他投资)；引自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官方发展援助)和世界银行(侨汇)。

注：其他投资包括非关联企业之间的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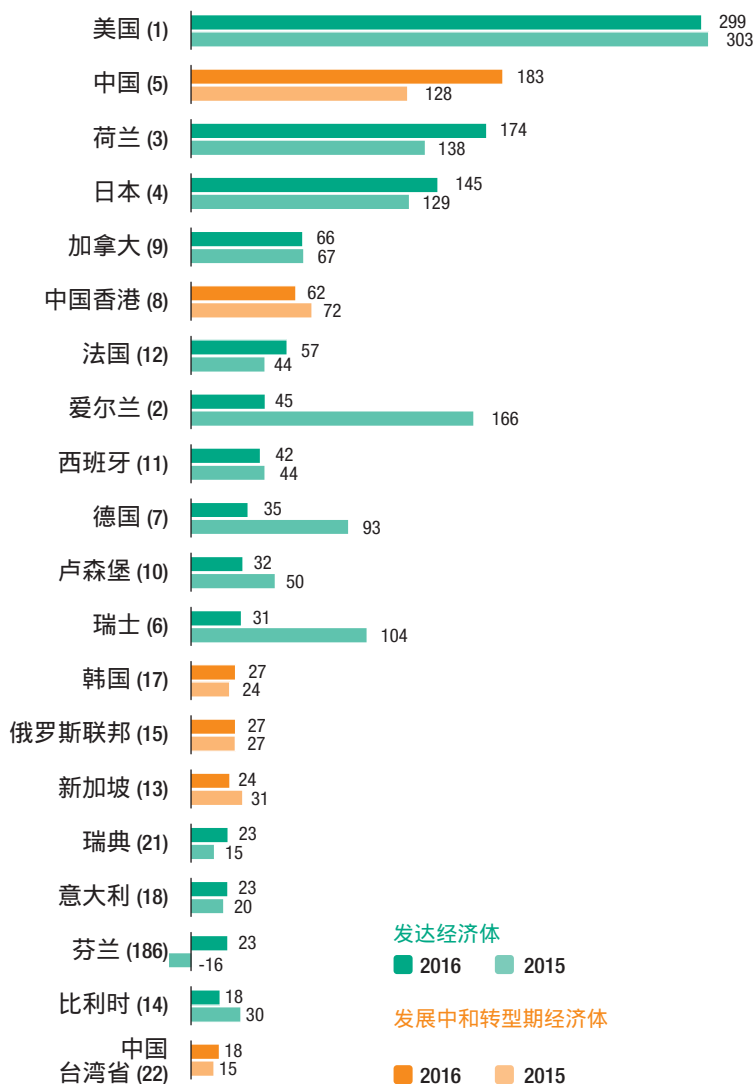
### 所有主要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下降

发达经济体的对外投资2016年减少了11%，降至1万亿美元。但这类经济体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的份额保持稳定，略高于70%，因为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投资量保持不变，为3,830亿美元，转型期经济体的对外投资量收缩了22%，降至250亿美元。欧洲多国企业的投资在2015年激增，但在2016年大步倒退，减少了23%，降至5,150亿美元。其原因在于爱尔兰、瑞士和德国大幅削减了对外投资量。北美洲多国企业的投资在2016年大体保持稳定，尽管这类企业跨界兼并和收购活动的购买价值大幅下降。美国在2016年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投资国，尽管流量略有下降(-1%)，为2,990亿美元(图6)。

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加了7%，为3,630亿美元。在中国企业跨界兼并和收购激增的推动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44%，达到1,830亿美元，使中国首次成为第二大投资国。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减少了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拉丁美洲

图 6. 2015和2016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排名前20位的经济母体(单位：10亿美元)

(x) = 2015年的排名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和加勒比地区的对外投资量也有萎缩。排名前20位的投资经济体中包括六个发展和转型期经济体。

##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趋势为大型经济集团所驱动

2016年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局面，继续由流入和源于20国集团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大型经济集团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所构建(图7)。流入20国集团的投资量首次达到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创记录水平。

有些集团 - - 英联邦、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非加太国家集团 - - 平均计算都是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净接受方，而其他一些集团(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则是外国直接投资的净输出方。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之外，多数大型集团的对外直接投资2016年都有增加。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的集团内互联关系在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中十分突出，在金砖五国和非加太国家集团正在增强。除这些大型集团之外，一带一路倡议这类区域间机制也将会在范围更广的国家激励外国直接投资。

## 对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高份额的进一步审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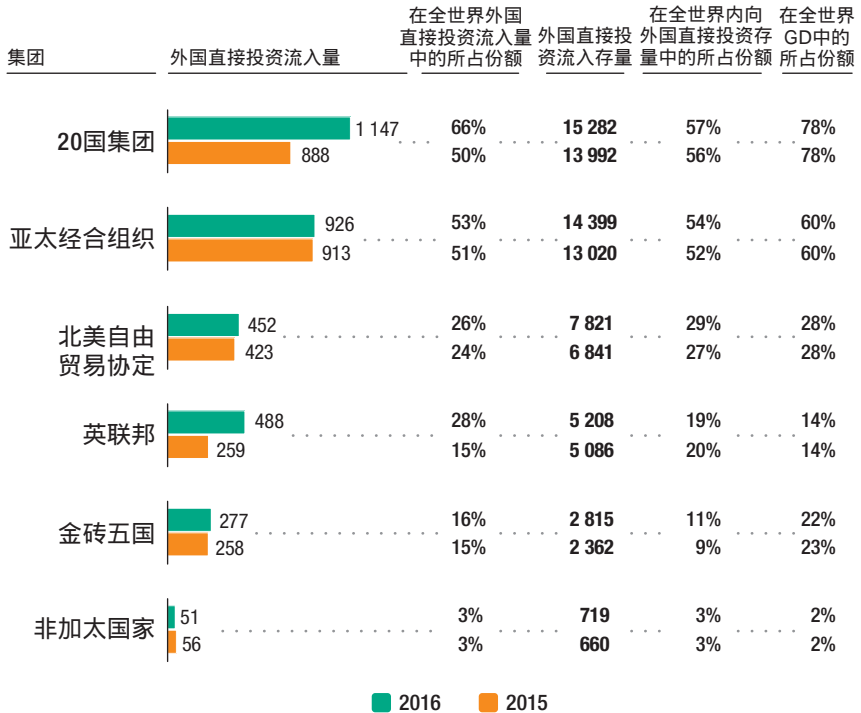
在2015年，制造业和初级产业部门分别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26%和6%。服务部门占了65%。详细审视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的内涵可以看出，其份额中有三分之二使人对第三产业在跨界投资中的比重产生了夸张的印象。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有很大一部分涉及的是初级部门产业的分公司和从事类似服务活动的制造业多国企业，包括总部或后勤职能部门、金融控股公司、采购或物流枢纽、分销服务、以及研究与发展部门。在部门性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中，此类活动按默认类别被划入服务业。所以，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可能被高估了三分之一以上。

## 国际生产增长率的进一步放缓影响了全球贸易

多国企业外国分公司的国际生产活动仍在扩张，但近些年来放慢了速度。外国分公司销售额、增加值和就业过去五年的平均年度增长率(分

图 7.

## 2015和2016年若干集团的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10亿美元和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注：20国集团=仅包括19个成员国(不包括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英联邦=英联邦共同体；金砖五国=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非加太国家=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集团。按2016年内向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从多到少顺序排列。

别为7.3%、4.9%和4.9%)均低于2010年以前的同期(分别为9.7%、10.7%和7.6%)。国际生产减速是贸易扩张放慢背后的成因之一。多国企业外国分公司的销售额和增加值在2016年分别增长了4.2%和3.6%。外国分公司的就业达到了8,200万人(表2)。外国分公司在东道经济体的内向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继续下降，从2015年的6.2%减少到了2016年的6%。

表 2.

## 2016年和若干其他年份的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若干指标

项目	现行价格价值(单位: 10亿美元)				
	1990	2005-2007 (危机前平均值)	2014	2015	2016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205	1 426	1 324	1 774	1 746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	244	1 459	1 253	1 594	1 452
内向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2 197	14 496	25 108	25 191	26 728
外向外国直接投资存量	2 254	15 184	24 686	24 925	26 160
内向外国直接投资收入	82	1 025	1 632	1 480	1 511
内向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	4.4	7.3	6.9	6.2	6.0
外向外国直接投资收入	128	1 101	1 533	1 382	1 376
外向外国直接投资收益率	5.9	7.5	6.4	5.7	5.5
跨界并购	98	729	428	735	869
外国分公司销售额	5 097	19 973	33 476	36 069	37 570
外国分公司增加值(产品)	1 073	4 636	7 355	8 068	8 355
外国分公司总资产	4 595	41 140	104 931	108 621	112 833
外国分公司出口额	1 444	4 976	7 854	6 974	6 812
外国分公司的就业(千人)	21 438	49 478	75 565	79 817	82 140
<b>备注</b>					
GDP	23 464	52 331	78 501	74 178	75 259
固定资本形成总值	5 797	12 431	19 410	18 533	18 451
专利和许可证收费	29	172	330	326	328
货物和服务出口	4 424	14 952	23 563	20 921	20 437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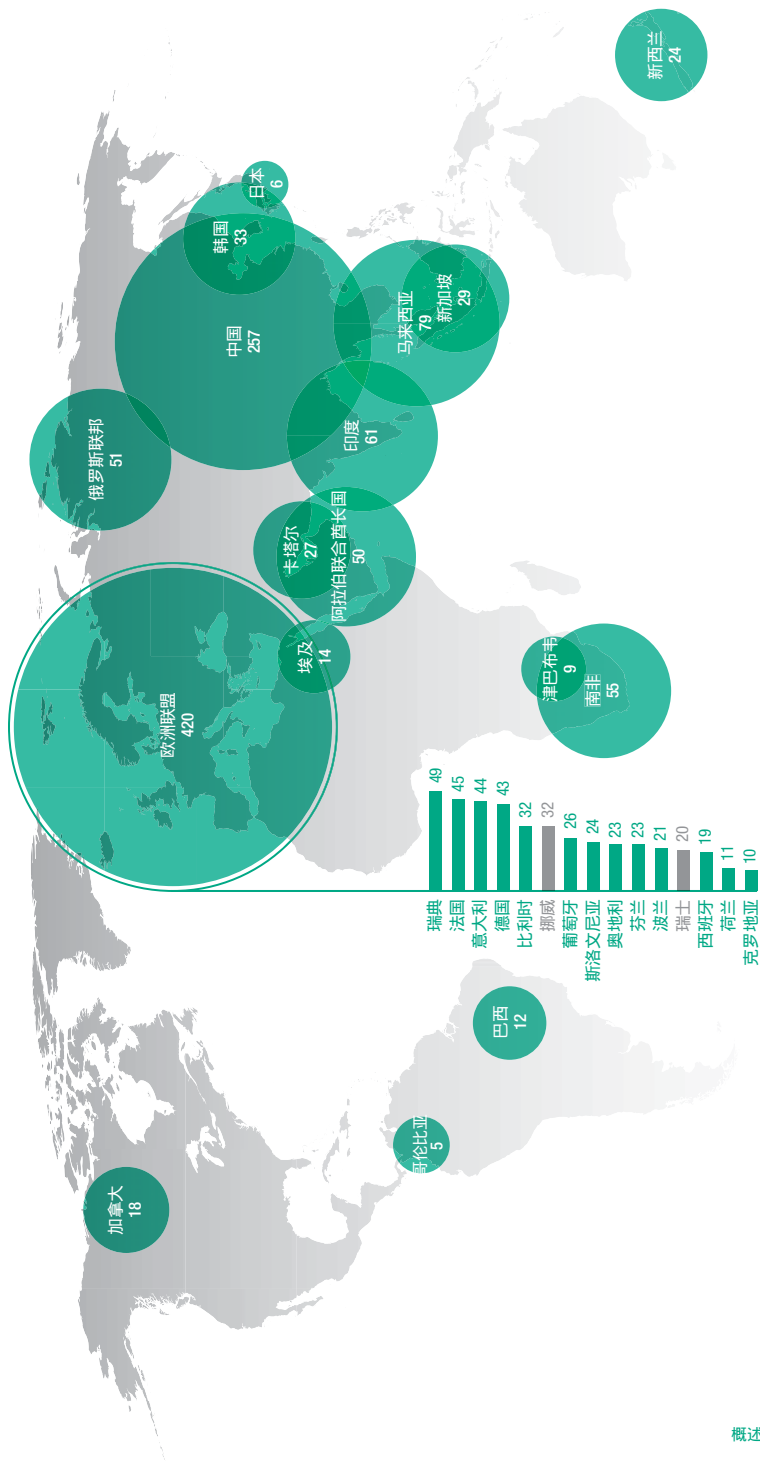
## 国有多国企业是主要的外国直接投资行为者

贸发会议新的国有多国企业数据库列有大约1,500家母公司,在世界各地经营的外国分公司超过86,000家。这些公司仅占全部多国企业的大约1.5%,但却占全部外国分公司的近10%。虽然国有多国企业为数不多,但非金融多国企业的世界100强中有15家、发展和转型期经济体的100强中有41家是国有企业。

这些“国有多国企业”的地理分布广泛,半数以上的总部在发展中经济体内,约三分之一设在欧盟。中国是国有多国企业最多的母国(18%),其次是马来西亚(5%)和印度(4%)(图8)。

在2016年,国有多国企业公布的绿地投资占全球总数的11%,大于2010年的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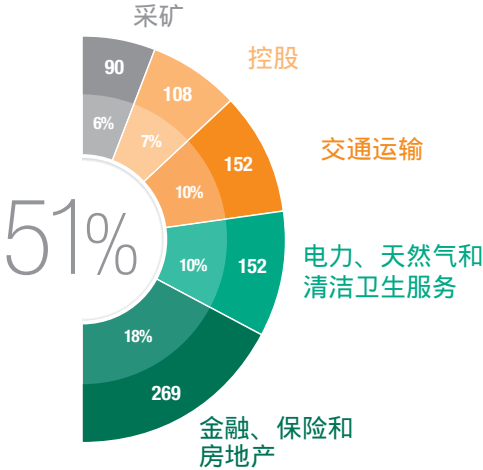
图 8. 国有多国企业：2017年按主要母体经济的分布 (单位：公司数目)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国有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与其他多国企业相比，国有多国企业的部门分布更偏重于金融服务和自然资源行业。按企业总部的主要经济活动衡量，半数以上的国有多国企业集中于五大产业：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电力和天然气及清洁卫生服务；交通运输；多元化控股公司和采矿业(图9)。大部分国有多国企业(超过1,000家公司，接近总数的70%)经营服务业活动(尽管将控股公司纳入此列可能会使这种估计过高)。制造业中约有300家国有多国企业(23%)，初级产品部门有110家(8%)。

**图 9.** 国有多国企业：2017年按主要部门或产业的分布  
(单位：国家数目和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国有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 区域投资趋势

### 初级商品价格低廉压抑了流向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

2016年进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继续下降，降幅为3%，减少至590亿美元(表3)。外国直接投资再次涌入埃及(区域性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接受国)促使北非的流入量增加。相反，低廉的初级商品价格损伤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济前景，削弱了投资者的兴趣。安哥拉的流入量再次下降，尼日利亚和南非的流入量依然处于较低水平。2016年东非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比较强劲，埃塞俄比亚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多国企业在非洲大陆日益活跃，但来自发达国家的多国企业仍然是最重要的投资者。

非洲多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小幅上升(1%至180亿美元)，主要反映了安哥拉的流出量增加(35%至110亿美元)，抵消了南非流出量的大幅下降(-41%至30亿美元)。

### 亚洲发展中地区几乎所有次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

进入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2016年减少了15%，降至4,430亿美元。这是自2012年以来首次下降，范围相对广泛，除南亚以外的各主要次区域都出现下降。总体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香港(中国)的流入量在2015年飙升之后又回到之前水平。跨境并购额减少也是一个原因，从2015年的500亿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420亿美元。在东亚，中国相对稳定的流入量限制了该次区域的整体下降。在东南亚，流入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下降。在南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持平，印度仅增长1%。在西亚，外国直接投资的持续下降反映了区域冲突和初级商品价格低迷的长期负面影响。

亚洲发展中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增加了7%，达到3,630亿美元。中国流出量的持续飙升推高了东亚地区的流出量，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疲软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拉低了东南亚的流出量。南亚流出量继续下滑，但西亚的流出量已触底回升。

表 3.

### 2014–2016年按区域分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以10亿美元计和以百分比表示)

经济体类别/区域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		
	2014	2015	2016	2014	2015	2016
<b>全世界</b>	<b>1 324</b>	<b>1 774</b>	<b>1 746</b>	<b>1 253</b>	<b>1 594</b>	<b>1 452</b>
发达经济体	563	984	1 032	708	1 173	1 044
欧洲	272	566	533	221	666	515
北美洲	231	390	425	353	370	365
发展中经济体	704	752	646	473	389	383
非洲	71	61	59	28	18	18
亚洲	460	524	443	412	339	363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70	165	142	31	31	1
大洋洲	2	2	2	1	1	1
转型期经济体	57	38	68	73	32	25
<b>结构薄弱、易受冲击和 小型经济体<sup>a</sup></b>	<b>68</b>	<b>64</b>	<b>58</b>	<b>26</b>	<b>14</b>	<b>10</b>
最不发达国家	41	44	38	18	9	12
内陆发展中国家	28	25	24	6	5	-2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6	4	4	0.3	0.7	0.2
备注：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百分比						
发达经济体	42.6	55.5	59.1	56.5	73.6	71.9
欧洲	20.6	31.9	30.5	17.7	41.8	35.4
北美洲	17.4	22.0	24.3	28.1	23.2	25.2
发展中经济体	53.2	42.4	37.0	37.7	24.4	26.4
非洲	5.4	3.5	3.4	2.3	1.1	1.3
亚洲	34.8	29.5	25.3	32.9	21.2	25.0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12.8	9.3	8.1	2.5	2.0	0.1
大洋洲	0.2	0.1	0.1	0.1	0.1	0.1
转型期经济体	4.3	2.1	3.9	5.8	2.0	1.7
<b>结构薄弱、易受冲击和 小型经济体<sup>a</sup></b>	<b>5.1</b>	<b>3.6</b>	<b>3.3</b>	<b>2.1</b>	<b>0.9</b>	<b>0.7</b>
最不发达国家	3.1	2.5	2.2	1.5	0.6	0.8
内陆发展中国家	2.1	1.4	1.4	0.5	0.3	-0.1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4	0.2	0.2	0.03	0.04	0.0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sup>a</sup> 未重复计算属于多个集团的国家。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进一步下滑

2016年，随着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投资放缓，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滑趋势有所加速，流入量下降了14%至1,420亿美元。经济衰退再加上疲软的初级商品价格和较大的货币波动性，严重影响流入南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导致其下降了14%至1,010亿美元。在中美洲，流入量也下降了14%至380亿美元，导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出口额增长进一步减速。加勒比地区(不包括金融中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9%至30亿美元)，但在国家层面差异很大。

2016年拉美多国企业的外国分公司向母公司汇回大量资金，所以对外投资下滑，下降了98%至10亿美元，是自200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 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反弹

2014年和2015年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急剧下降后，2016年上升至680亿美元。两个主要次区域走势分化。在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格鲁吉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几乎翻番，这得益于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的流入量强劲上升。东南欧的流入量因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减少，下降了5%。主要投资者母国经济体清单显示逐步转向偏好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

2016年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向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了22%至250亿美元，主要由于哈萨克斯坦的流出量为负(-50亿美元)。俄罗斯联邦的流出量占该地区总额的大部分，虽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减少了，其流出量仍小幅增长至270亿美元。

## 大型并购有助于维持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长了5%，达到1万亿美元。在欧洲，跨国并购销售额创历史新高，但被公司内部贷款的下滑所抵消，导致流入量收缩6%。尽管联合王国的脱欧公投产生了不利影响，但由于完成了多项巨型并购交易，其流入量上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相比之下，除加拿大以外，北美和亚太地区发达国家的流入量有所扩大。



受完成并购交易(特别是制药行业)的推动,美国的流入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澳大利亚扭转了2013-2015年的下滑趋势,流入日本的投资则出现了持续复苏的迹象。

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下降了11%至1万亿美元。欧洲国家的流出量整体下降了23%,主要由于爱尔兰(下降73%至450亿美元)、瑞士(下降71%至310亿美元)以及德国(下降63%至350亿美元)的流出量大幅下降。北美的流出量稳定,但与前几年一样,其中大部分是海外收益留存。日本多国企业通过跨境并购(尤其是在欧洲的并购)增加了外国直接投资。

### 流入结构薄弱和易受冲击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依然脆弱

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5年达到440亿美元高位之后,减少了13%至380亿美元,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2%,占所有发展中经济体流入量的6%。然而,逾20个最不发达国家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比去年多,由相对多样化的主要外国直接投资东道经济体引领,如柬埔寨和埃塞俄比亚。中国仍然是最不发达国家最大的投资国,远远领先于法国和美国。虽然已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外国直接投资绿地项目的部门分布侧重于有潜力吸引更多投资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但在可预见的将来,石油和天然气投资将继续推动最不发达国家的整体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32个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继2015年大幅下降后,在2016年稳定于240亿美元。内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发挥的作用仍然微弱,在全球流入量的占比不到2%。各区域和东道国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动态有差异。转型期经济体(特别是哈萨克斯坦)的外国直接投资实现增长,埃塞俄比亚的流入量连续第四年上涨,而蒙古的流入量转为负值。虽然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侧重自然资源,但投资正转向其他经济活动,如基础设施和制造业,有助于缓解这些国家的地域劣势。来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投资者在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比越来越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前景可持谨慎乐观态度。持续复苏仍然取决于初级商品价格和各种

政治问题的演变，这些问题可能会对今后的外国直接投资造成压力。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本来就很少，现又下降了6%至350亿美元。自2009年以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所占份额停滞在0.5%以下。马尔代夫和毛里求斯流入量的复苏被其他十几个经济体流入量的减少所抵消。在吸引更多元化的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牙买加处于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在外部资金来源中，流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波动性自2008年以来变得更加明显，而侨汇和官方发展援助仍然保持稳定。在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十大投资者中，发展中经济体占了七个，但发达经济体加拿大和美国是最大的投资者，投资额遥遥领先。

## 投资政策趋势

### 投资政策变得更加复杂、更加多样和更不确定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种种考虑加大了投资政策的挑战性和多面性。政策的制定变得更为多样化，反映出社会和政府正在用各种方法应对全球化的影响。多样化的政策再加上更频繁政府干预措施，对投资者而言降低了投资政策的可预测性。

虽然许多国家继续推动外国投资，但一些国家对外国收购和公司的个别投资决定采取更为严苛的立场。在国际层面上，国际投资协定改革正在全面推进，既带来了条约的更新换代，也导致一些国家退出了该制度。超大型区域协定的谈判和实施日趋困难。

随着政府重新定位，这些动态可能是在迅速变革的世界上暂时出现的动荡，或许政府会宣布更持久的政策变化。基于规则的投资制度是可信的，得到广泛的国际支持，旨在实现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可有助于减少不确定性和改善投资关系的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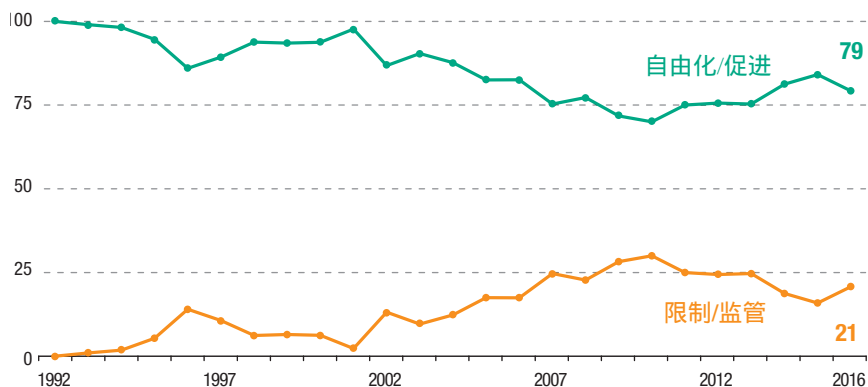
### 各国仍然热衷于吸引投资，但是监管和限制措施的比例在上升

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2016年约有58个国家和经济体采取了至少124项影响到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这是自2006年以来的最大数目。其中，84项与投资的自由化和促进有关，22项引入了限制或监管投资的新条例(其余18项措施属于中性)。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投资措施占79%，远低于贸发会议1990年代年度报告初期阶段的比例(94%)(图10)。

很多行业放宽了外国投资者的准入条件，特别是金融服务业、采掘业和房地产业。许多国家简化了注册程序，提供了新的投资激励措施或改革其国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其他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一些国家正在实行私有化并采用新的公私合作机制。

新的投资限制或管制主要反映了对战略性产业的外资所有权、国家安全和本地生产者竞争力的担忧。这些担忧不仅体现在东道国的立法

图 10. 1992-2016年国家投资政策改变情况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投资政策监测数据库。

上，还体现在其行政决定中，特别是在与外国收购有关的兼并控制方面。公司还面临影响其投资决定的政治压力，以及不鼓励它们到国外投资的留存措施。此外，世界贸易组织报告的日益增多的贸易限制可能会对外国投资者造成负面影响，特别是在全球价值链中经营的投资者。所有这一切都限制了上文所述有利于外国投资的总体政策环境。

### 许多国家的投资法与国际投资协定重叠

贸发会议近期的一次调查显示，100多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通过专门的国家投资法管理跨境投资，这些专门投资法处理的一系列问题与国际投资协定处理的问题类似。投资法和国际投资协定都以序言或设定目标和范围的章节为开篇，都载有关于定义、投资的入境和设立、待遇和运营、投资促进和争端解决的规定。迄今为止，无论可持续发展问题还是投资便利化问题，都不是投资法和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突出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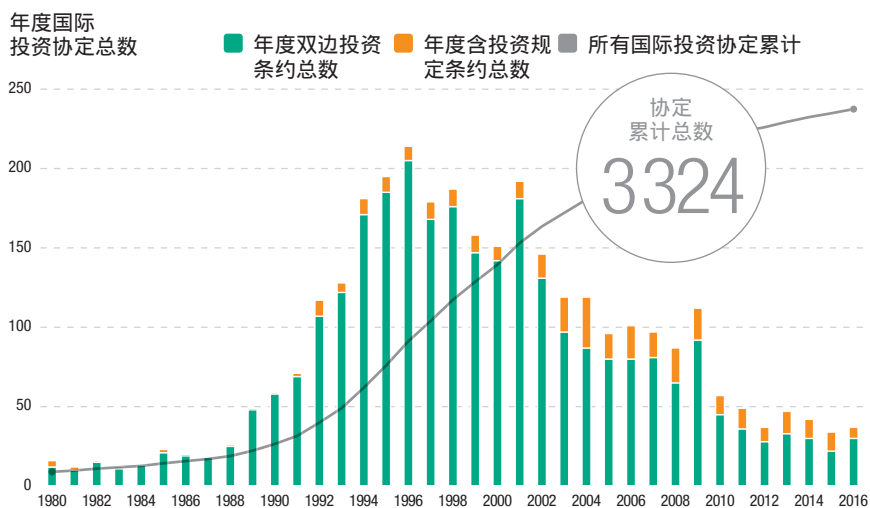
虽然投资法和国际投资协定有许多共同点，但在具体条款和起草细节上表现出相当大的多样性。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和相应条款的与时俱进应齐头并进。

## 国际投资协定体系在更复杂的环境中继续扩大

2016年，各国缔结了37项新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30项双边投资条约和7项含投资规定的条约。这使协定总数达到3,324项(2,957项双边投资条约和367项投资规定条约)(图11)。最活跃的国家是土耳其，其缔结了七项条约，其次是加拿大、摩洛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分别缔结了四项条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尼日利亚各缔结了三项条约。2017年1月至3月期间，又签署了四项国际投资协定。

各国政府还重新调整它们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参与程度。至少有19项国际投资协定终止了效力，今后还会有更多。印度尼西亚(终止了11项)和印度(终止了7项)在终止条约方面表现得尤为积极。具有实质性投资

图 11. 1980-2016年签署国际投资协定的趋势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国际投资协定导航。

规则的超大型区域条约的前景仍然不确定，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或《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

## 新的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 案件有增无减，超过10年平均水平

2016年，在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了62起已知案件(图12)。该数字低于前一年，但高于每年49起案件的十年均值(2006–2015年)。截至2017年1月1日，公开申诉总数达到767项。到目前为止，已有109个国家对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下提出的一项或多项已知申诉作出回复。由于在某些情况下仲裁可以保密，所以今年和往年提交的争端实际数量可能会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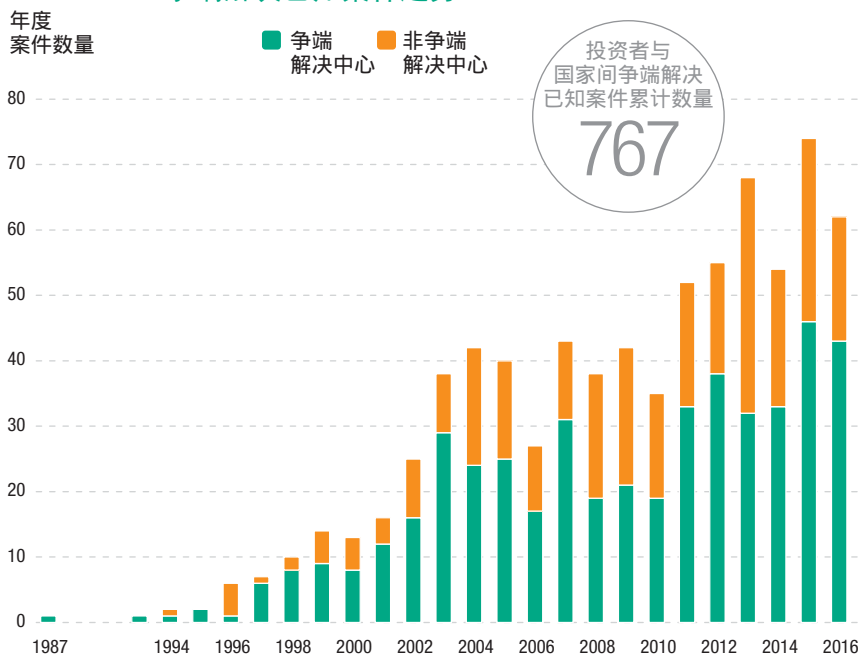
2016年公布了四十一项仲裁裁决。在这些裁决中，国家在管辖权阶段胜诉的案件约有一半，而投资者在进入审议案情阶段的案件中胜诉的较多。在根据案情裁决的已知案件中，投资者胜诉了60%。

## 二十国集团通过了《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非约束性的《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得到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批准，这是在包括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等不同经济体构成的一个集团内就投资问题首次达成的多边协商一致意见，这些经济体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全球外向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欧盟)。以贸发会议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政策框架》为基础，二十国集团的这套原则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 新一代要素：《指导原则》包含重要的新一代投资政策要素，如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出于公共政策目的的监管权和负责任的商业做法。
- 全球声明：《指导原则》是二十国集团对投资政策和条约制定的四个关键组成部分的集体立场的声明：即建立、保护和待遇、促进和便利化以及争端解决。

**图 12.** 1987–2016年基于条约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已知案件趋势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导航。

注：资料是基于公开资料编制，包括专业报告服务。贸发会议的统计数字并不涵盖根据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的完全基于投资合同(国家合同)或国家投资法的案件，也不包括一方表示有意向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申诉但尚未开始仲裁的案件。年度和累积案件数量经核查而不断调整，可能与前几年报告的案件数量不一致。

- 提高一致性：《指导原则》的主要驱动力是希望加强国家和国际政策之间的一致性，强化投资政策与其他政策领域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
- 微妙的平衡：《指导原则》试图在公司和国家的权利与义务、自由化和监管、东道国和母国的战略利益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

- 非约束性文书：《指导原则》是非约束性的。它们主要作为审查和制定国家投资政策和战略的指导文书。它们也作为起草和谈判国际投资条约的重要参考。

##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

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已进入国际投资政策制定的主流。大多数新条约遵循贸发会议的路线图(《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 巩固了第一阶段的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路线图规定了五个行动领域：在提供保护的同时维护监管权；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促进和便利投资；确保负责任的投资；以及加强制度的一致性。

至2010年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被视为具有创新意义的一些条款现在几乎经常出现在国际投资协定中。近期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几乎都包含至少一项或两项改革特征，通常是关于保障东道国监管权，改善争端解决机制或促进负责任投资的新措辞。此外，近期的一些国际投资协定采用早期国际投资协定中未使用的新方式在这五个行动领域采取措施。但是，一些国家不再采取现代条约起草做法。此外，一个国家几乎在同一时间缔结的不同国际投资协定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由此引起的关切是，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内在不一致和体系破碎情况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

改革争端解决机制是议程的优先事项，设有具体的步骤(例如，将以改革为导向的条款纳入新条约，致力于设立国际投资法院)，包括在多边层面上的步骤。在投资条约制定中，投资便利化也成为了更令人感兴趣的领域。贸发会议在《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的投资便利化全球行动菜单，旨在填补国家和国际投资政策制定方面的制度缺陷，以期调动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该菜单获得了所有投资和发展利益有关方的大力支持。



## 现在已经到迈向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二阶段的时候了: 既有老一代条约的整体现代化

若干因素表明很有必要改革现有条约网络。旧条约比比皆是: 在2010年之前缔结的现在仍有效的国际投资协定有2500多项(占有有效协定的95%)。旧条约有其不良影响: 截至2016年底, 几乎所有已知的投资者与国家间投资争端解决诉讼案件都是以这类条约为依据提起的。而且, 旧条约将种种不一致加以固化: 其持续存在造成条约关系的重叠和破碎, 形成交互挑战。

贸发会议介绍和分析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二阶段(将旧条约现代化)10个政策选项的利弊(图13):

1. 共同解释条约条款: 国际投资协定条款措辞宽泛, 可能会在投资人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程序中造成意想不到的和相互矛盾的解释。共同解释旨在澄清条约义务的含义, 可以帮助投资者、缔约方和法庭减少不确定性并增强可预测性。
2. 修订条约条款: 有时通过共同解释也难以“确定”旧国际投资协定共同规定的广泛义务。通过修订条约条款, 各方可以实现更大程度的变革, 从而确保经修正的条约反映它们不断变化的政策选择。
3. 更替“过时的”条约: 条约更替提供了对条约进行全面修订的机会, 而不是选择性地修订个别条款。
4. 巩固国际投资协定网络: 废除多个“旧版”双边投资条约并用新的多边国际投资协定替代, 可以有助于使条约内容现代化, 同时减少国际投资协定网络的分散化。
5. 管理共存条约之间的关系: 如果国家选择同时维持“旧版”和“新版”条约, 在发生冲突或不一致的情况下, 只有以新的、更现代化的国际投资协定为准, 才能实现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目标。
6. 参照全球标准: 在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努力中, 各国可以参照多边承认的标准和手段, 这些标准和手段反映了对有关问题的广泛共

图 13.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第二阶段选项概览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识。参照它们可以澄清一个条约的目的和宗旨，同时帮助克服国际投资协定与其他国际法和决策机构之间不成体系的问题。

7. 开展多边协作：国际社会协作改革国际投资协定可以产生最大的影响，但也是国际投资协定改革最困难的途径。
8. 摒弃未经批准的旧条约：许多旧双边投资条约尚未生效。一个国家可以正式表明其决定不受这些条约的约束，以帮助清理国际投资协定网络，并促进关于新的、更现代化条约的谈判。
9. 终止已有的旧条约：终止“过时的”国际投资协定(包括单边或联合)是免除各方义务的最直接的方式(尽管并非总是即时生效)，但也可能影响它们作为投资地点的吸引力，并削弱对在国外投资的国民的保护。

10. 退出多边条约：单方面退出与投资有关的多边条约可能有助于减少一个国家面临的投资者申诉风险，但也可能影响其作为投资地点的吸引力，并削弱对在国外投资的国民的保护。这也可能对未来的投资多边合作构成挑战。

这10个选项有助于应对贸发会议《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路线图》中提出的5个重点领域。这些选项的性质和结果是不同的，有些技术性较强，有些政治性较强，有些注重程序，有些也注重实质内容，有些持续参与国际投资协定制度，有些退出该制度。各国可以修改和采用这些选项来达到期望的改革目标。

要想确定这10个政策选项中有哪些在特定情况下适合于一个国家，就必须开展慎重且以事实为根据的成本效益分析，同时应对一系列范围更广的挑战。各种战略挑战中包括防止改革“过头”，这种情况会使国际投资协定制度脱离保护和促进投资的宗旨。改革努力(特别是全面改革努力)应能够加强法治带来的好处，并回应投资者对政策决定的可预测性、稳定性和透明度的期望。

在一个由内容和类型不同的数千项协定构成制度中，制度上的种种差距、重叠、不一致和碎片化的问题造成系统性挑战。改革应努力改善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一致性，巩固和精简国际投资协定网络，并管理国际投资协定与其他国际法机构之间的互动。

协调性挑战要求对改革行动进行优先排序，与条约伙伴妥善安排执行顺序，并协调政策制定不同层面的改革努力。能力挑战使较弱小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和较小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有效地应对老一代国际投资协定的不足。

增强多边支持会有利于综合性的制度改革。贸发会议是联合国负责处理国际投资问题的协调中心和就当今多层和多面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开展高级别和包容性讨论的国际论坛，通过其研究和政策分析、技术援助及建立政府间共识这三大工作支柱，可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 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的资本市场政策在增加

为促进对可持续工商业的投资和为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制定的资本市场相关政策和工具，正在全世界迅速增加。这些政策和工具主要由证券交易所及其监管机构制定，但也包含其他资本市场利益有关方(包括机构投资者)的大力参与。

在过去两年中，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SSE)倡议的成员增长至原来的三倍多。现在包括来自五大洲的63个伙伴交易所，上市公司逾3万家，市值超过55万亿美元。这种快速增长表明交易所越来越关注其市场的可持续性。

证券交易所通过一系列工具促进可持续发展投资，包括环境、社会 and 治理(ESG)指数、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导文件以及绿色债券等特殊目的投资工具。环境、社会 and 治理指数仍然是最受各交易所欢迎的可持续性工具，全球有一百多个关于环境、社会 and 治理的主题指数，82个交易所中有38个提供这些指数。约32个证券交易所向发行人提供关于报告环境、社会 and 治理信息的正式指导，其中17个交易所在2016年和2017年初首次引入这样的指导。除了提供自愿指导，12个交易所将环境、社会 and 治理信息纳入其上市规则。证券交易所以及证券监管机构规定了强制的环境、社会 and 治理披露规则。

## 投资与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是指将互联网数字技术应用于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贸易，正成为全球经济中日益重要的一部分。向数字经济过渡能够推动跨越所有部门的竞争力、经营和创业活动的新机会、进入海外市场的新渠道和对全球电子价值链的参与。数字经济还能为处理长期存在的发展和社会难题提供新的工具。然而，数字经济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需要政策制定者应对，包括需要弥合数字鸿沟，尽可能减少潜在的负面社会和发展影响，以及处理复杂而具体的互联网监管问题。与数字经济相关联的机遇和挑战对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数字经济对投资具有重要影响，而投资对于数字发展又至关重要。首先，数字经济有潜力改变多国企业的国际运营活动和外国分公司对东道国的影响，从而影响投资政策。第二，所有国家的数字发展，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数字经济的参与，都要求制定出有针对性的投资政策，以建立连通性基础设施、促进数字公司的发展并支持更广泛经济的数字化。《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依次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 数字化转型国际生产和多国企业

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是国际生产增长的一个基本推进因素。数字经济的兴起既强化了信通技术与国际生产之间的共生关系，同时也干扰了这种关系。这种强化在于其为多国企业提供了更深远的机会，以重新设计流程和上市路线，并重新界定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治理模式。干扰在于其催生了全新的多国企业模式，从“天生国际化企业”到虚拟多国企业，国际足迹完全不同。

信通技术多国企业(即电信多国企业和技术多国企业)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推动力：它们为数字技术的采用提供基础设施和工具。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增长，技术多国企业在国际生产中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十年中急剧上升，在过去五年中进一步加快。2010年至2015年期间，贸发会

议的多国企业百强榜单中的技术公司数量由4家增长到10家(信通技术公司总数增长到19家)。这类多国企业在所有其他行业都是大型高速增长企业；它们的资产增长了65%，营业收入和雇员人数增长了约30%，而百强中的其他多国企业则走势平淡。

## 数字多国企业：国际足迹小，但影响大

数字多国企业(一个新类别)基于信通技术多国企业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工具而建立。这类企业有多种商业模式，包括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和数字内容公司(图14)。数字企业在多国企业中的重要性也在迅速提升。《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了新的数字多国企业100强，并阐述了它们的国际生产足迹。

数字多国企业和技术多国企业的国际生产配置比例相对较小。它们可以凭借有限的资产和少量的雇员进军外国市场。其他多国企业报告称，外国资产和销售额的比例保持平衡，而技术多国企业仅有41%的资产放在母国以外，但73%的销售额在海外实现(图15)。多国企业经营模式的互联网强度越高，其外国营业收入与有形资产之间的相关性就越小。最大的互联网平台的国外销售额比例比外国资产比例大2.5倍。因此，数字多国企业对东道国的影响，在有形投资和创造就业方面的直接可见度较低，但其投资可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和生产力影响，并促进数字发展。

数字多国企业总部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它们以有限的外国投资就能实现全球运营，这可能扭转过去十年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民主化”的主导趋势，使外国直接投资集中于少数大国，尤其是美国。约三分之二的数字多国企业母公司及其近40%的分公司设在美国，而其他大型多国企业则只有20%的母公司和分公司设在美国。

技术和数字多国企业对国际生产中无形资产和流动资产的价值有重要影响。2015年，技术多国企业的无形资产价值(相对于资产的账面价值)是其他超大型企业的两倍。高价值无形资产和强劲的运行利润率使技

图 14. 数字经济的架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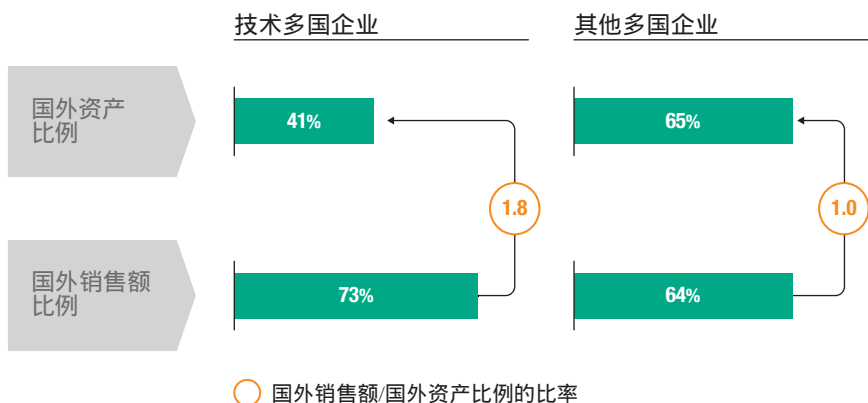
数据多国企业，开展基于互联网或与互联网密切相关的活动

信通技术多国企业，提供有利的基础设施支持互联网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术公司拥有大量现金储备。技术多国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占总资产的近30%，这一比例是其他大型多国企业的两倍以上。这些现金持有量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外国收益留存。美国数字多国企业报告2015年末汇出的外国收入占外国收入总额的62%，比其他美国多国企业几乎大了三倍。高额未汇出外国收入和较低外国有形固定资产(小六倍)表明，这些资源对生产能力海外投资的贡献相对较小。

图 15. 贸发会议多国企业100强的国外资产比例和国外销售额平均值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 数字技术的采用最终将影响所有多国企业

数字经济并不局限于信通技术部门和数字企业。可以说，最大的经济影响来自全球经济各个行业的流程和供应链的数字化。数字化可以影响供应链中的每个流程，包括采购、生产、运营单位网络的整体协调、出货物流和客户关系。数字企业的国际生产情况可能是许多行业未来的预兆。它们可能代表了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所有多国企业的转型过程的终极。到目前为止，数字化对非数字多国企业的国际业务(外国资产、销售和雇员)的影响有限，但已经出现了倾向资产轻型国际生产和替代性治理模式的趋势。

数字部门以外的多国企业采用数字技术可以在许多方面改变国际生产。可能出现不同的情景，影响到国际生产趋势走向(趋于更集中或更分散的生产)、国际生产的性质(涉及的活动类型)和国际生产的影响。例如，数字孪生体生产基地和三维打印可能会导致对更多国家的投资减少。相反，大数据和大规模定制技术可能会导致生产基地数量越来越少，规模越来越大。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服务化”过程，可能增加



外国分公司在服务领域、承包活动和非股权关系方面的活动。与此同时，技术和知识产权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提升，也可能促使一些海外承包业务回流。最后，数字化带来的脱媒趋势可能导致东道国的一些部门(例如零售商和分销商)蒙受损失。同时，创建了新的分销伙伴关系，可提供新的增值服务。

## 对投资政策制定者的战略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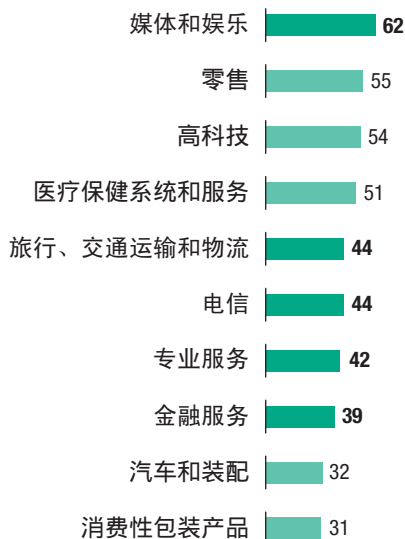
对于投资政策制定者而言，国际生产中的新行为体以及多国企业国际业务不断演变的性质对战略性投资定向有影响。其经济体在数字经济中吸引国际投资的竞争优势可能会有所不同，数字经济对某些因素的依赖度较低，如低成本劳工，而对其他因素的依赖度较高，如技能和低成本能源。这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特别的挑战。

数字部门投资也对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和制度有影响。例如，通常是根据直接的实际投资影响(创造的生产性资产和就业机会)来衡量投资促进机构，而这在数字部门投资中没那么明显。此外，数字化对于管理投资者行为的规章也有影响。可能需要根据新的数字商业模式审查原本为实体经济制定的投资规则。这同样适用于具体部门的规章。受数字化影响最大的许多传统行业(如零售、媒体和(消费)金融)也是许多国家限制投资的行业(图16)。(因此，还会对国际投资协定有影响，因为这些行业往往对国际投资协定有保留)。此外，数字多国企业正在跨界经营，并干扰其他高度受管制的行业(例如运输)。一些模拟时代的规章可能已经过时(例如电子商务可能会绕过的零售限制)，或无意中阻碍数字技术的采用(例如实际上阻止新数字进入者的部门性规章)；另有一些规章可能需要适应数字时代才能实现其公共政策目标。最后，也是在国际层面上，政策制定者需要评估电子商务和服务贸易中不断演进的规则对投资条约的制定有何种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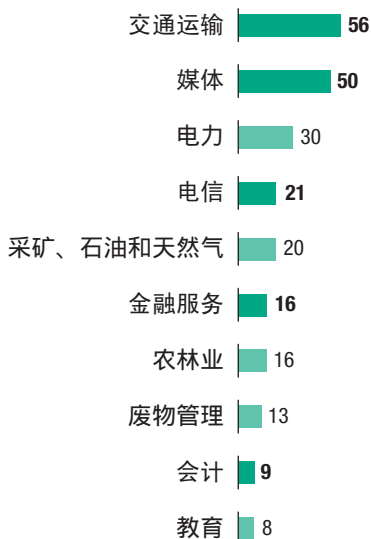
图 16.

## 受数字化和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影响最甚的10大行业 (百分比)

受数字化影响最甚的行业排名  
持此观点的高管人员比例(受访者)



外国直接投资受限制的行业排名  
实施限制的国家比例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基于麦肯锡公司(2017年)和世界银行跨境投资数据库(<http://iab.worldbank.org>)。

## 投资政策是数字发展的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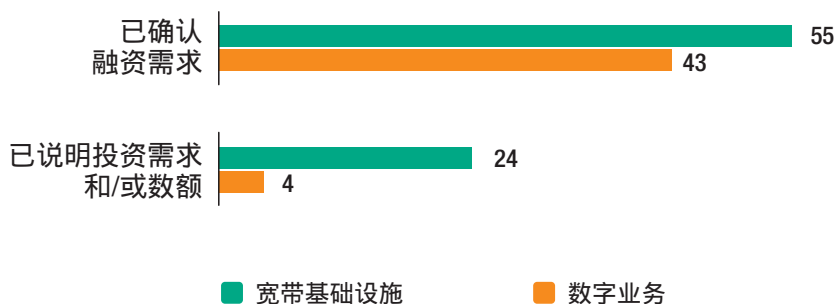
许多国家已颁布或准备颁布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载有对100多项国家和区域数字发展战略投资层面的调查结果。虽然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行业的发展必然涉及大多数国家的大量投资(大部分数字发展战略都承认这一事实)，但很多战略，要么未能处理投资问题，要么仅仅很一般化地提到投资需求。其中包含基础设施投资

需求详情的不到25%，提到基础设施以外包括数字产业发展投资需求的不到5%(图17)。

大部分战略虽然缺乏投资需求详情，但都讨论了潜在的融资来源，大部分阐述了公共筹资方案。约四分之三的数字发展战略还提出了刺激私人投资或企业发展的措施，最常提及的是创建有利的监管框架、一般财政激励措施和投资便利化。约三分之一的战略承认外国投资对数字发展的潜在贡献，只有3%的少数战略规定了投资促进机构的作用。

另一项对90多个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结果表明，一方面，希望投资机构与负责促进数字发展的各部委和公共机构之间有更好的政策协调。鲜有投资促进机构参与拟订数字发展战略。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投资促进机构而言，促进对数字基础设施和企业的投资是一个优先目标。但是，只有少数机构确认有促进或便利化工具可用于数字行业。

图 17. 按目标分列数字化发展战略的投资层面对102项战略的调查结果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数字战略调查。

注：包括任何载有关于融资的章节或段落战略。

规定了投资需求详情的数字发展战略往往完全偏重于基础设施(如宽带覆盖面)。综合全面的数字发展战略应当覆盖对数字基础设施、对数字公司和对各行业公司采用数字技术的投资。

## 建设数字基础设施

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现充分连通而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可能并不像通常想见的那么庞大：通过有利于私人投资的框架和旨在创造足够需求的政策，用于建立普遍宽带覆盖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普遍接入指标的先决条件)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可以实现的。为帮助政策制定者填补数字发展战略的不足，《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工具，有助于对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做出预估。根据这一工具(仅考虑全面的基本3G网络覆盖面)，贸发会议预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普遍覆盖面涉及的总投资成本不到1,000亿美元。

普遍连通的实现，包括在人口稀少和低收入地区实现普遍连通，需要得到政府支助和建立多种公私伙伴关系形式。虽然电信公司建立了大量的网络和互联网交换点，但吸引数字多国公司可帮助充实使互联网基础设施(如内容分配网络和数据中心)。开展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区域投资合作，可以增加基础设施项目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

## 建立数字部门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连通程度很高，但使用率很低，所以加快数字化发展需要侧重于对本地数字内容和服务的投资，以增加需求。这应包括为数字公司建立和保持一个有利的监管框架，并采取积极的支持措施，其中可包括技术或创新枢纽或孵化器，来刺激对企业发展的投资；建设或改进电子政府服务以发挥牵头作用，为本地开发商创建需求并降低企业成本；支持创投供资和其他创新型筹资办法，如众筹；并制定技能培养方案。与全球化公司建立关联可能会有帮助，外国投资者参与本地数字公司可加速它们的增长，但数字行业的发展主要是支持本地企业发展，而不是偏重于促进数字多国企业的投资。

## 加快更大经济范围中的数字采用

最大的发展价值很可能在于非数字化部门公司的数字化。发展中国家企业使用互联网的程度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促进所有公司的信通技术投资以及促进各种工商关联和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应当成为数字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司采用数字技术需要对互联网接入、设备和计算机以及相关培训的投资。若干因素将对该领域的投资决策产生影响。首先，数字服务的政策环境对所有行业的公司都有相关性，因为所有公司都受到诸如数据保护和隐私等规章的影响。其次，对各种设备收费和缴税及互联网使用税会影响到公司采用信通技术的有效成本。便利各种云服务的接入可降低此类成本。技能发展(可与全球性数字多国公司及其关于此目的的现有方案开展合作)也很重要，可为公司提供有效采用和使用互联网技术和服务的能力，并使本地公司能够与多国企业开展数字互动和进入电子价值链。

## 平衡公共政策关切和投资者的利益

政策制定者在促进数字发展投资的同时，需要处理各种公共关切。这就要求在数据安全、隐私权、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保护和维护文化价值观等领域制定与时俱进的法规。如果数字变革在其他部门造成干扰或产生了负面的社会或经济影响，政策制定者就需要出台政策缓解此类影响。总之，政府需要找到平衡的办法兼顾公共关切和私人投资者的利益。

## 为数字经济建立投资政策框架

鉴于投资(包括国际投资)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全球数字经济对国际生产的变革性影响，很重要的一点是，政策制定者要对数字

发展战略中的投资问题采取结构化和更为积极主动的方法。一个综合全面的数字经济投资政策框架应确保将数字发展嵌入投资政策，并将投资政策嵌入数字发展战略(图18)。

图 18. | 数字经济投资政策框架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 历年的世界投资报告

- WIR 2016: Investor Nationality: Policy Challenges
- WIR 2015: Reform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 WIR 2014: Investing in the SDGs: An Action Plan
- WIR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 WIR 2012: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
- WIR 2011: Non-Equity Mode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 WIR 2010: 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
- WIR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 WIR 2008: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 WIR 200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 WIR 2006: 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 WIR 200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 WIR 2004: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
- WIR 2003: 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 WIR 200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 WIR 2001: Promoting Linkages
- WIR 2000: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 WIR 199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 WIR 1998: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 WIR 199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Market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 WIR 1996: 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rrangements
- WIR 199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 WIR 1994: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ment and the Workplace
- WIR 1993: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 WIR 199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Engines of Growth
- WIR 1991: The Triad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贸发会议关于投资和企业的若干方案

##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worldinvestmentreport.org](http://worldinvestmentreport.org)

## World Investment Forum

[unctad-worldinvestmentforum.org](http://unctad-worldinvestmentforum.org)

## UNCTAD Investment Policy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pfsd](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ipfsd)

## UNCTAD Entrepreneurship Policy Framework

[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ed2012d1\\_en.pdf](http://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diaeed2012d1_en.pdf)

## Sustainable Stock Exchanges Initiative

[sseinitiative.org](http://sseinitiative.org)

## Business Schools for Impact

[business-schools-for-impact.org](http://business-schools-for-impact.org)

## Investment Policy Hub

[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

## FDI Statistics

[unctad.org/fdistatistics](http://unctad.org/fdistatistics)

## Investment Trends and Policies Monitors

[unctad.org/diae](http://unctad.org/diae)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unctad.org/iaa](http://unctad.org/iaa)

##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s

[unctad.org/ipr](http://unctad.org/ipr)

## ISAR Corporate Transparency Accounting

[unctad.org/isar](http://unctad.org/isar)

##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unctad.org/tnc](http://unctad.org/tnc)



[worldinvestmentreport.org](http://worldinvestmentreport.org)

## 如何获得出版物

出售的出版物可在世界各地通过联合国出版物的经销商购买。也可通过邮购获得：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Customer Service  
c/o National Book Network  
15200 NBN Way  
PO Box 190  
Blue Ridge Summit, PA 17214  
email: [unpublications@nbnbooks.com](mailto:unpublications@nbnbooks.com)

[unp.un.org](http://unp.un.org)

如欲索取外国直接投资和多国企业方面的进一步信息，可致函：

Division on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Palais des Nations, Room E-10052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Telephone: +41 22 917 4533  
Fax: +41 22 917 0498  
[unctad.org/diae](http://unctad.org/diae)



[worldinvestmentreport.org](http://worldinvestmentreport.org)